

楚辭研究與爭鳴

楚辭學集刊第一輯

湯炳正題



# 楚辞研究与争鸣

[楚辞学集刊第一辑]

主 编 黄中模

副主编 王开富 何明新

《楚辞研究与争鸣》编委会编

团结出版社

1989年12月

封面题字 汤炳正  
责任编辑 史式

### 楚辞研究与争鸣

《楚辞研究与争鸣》编委会编

主编黄中模 副主编王开富 何明新

\*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数：大32开 字数：190,000 印张：8.5

印数1—2000 定价：3.50元

# 《楚辞研究与争鸣》编委会

顾问：姜亮夫 汤炳正 林庚 魏际昌  
王利器 聂石樵 谭优学

主编：黄中模

副主编：王开富 何明新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冰 马达 马成生 王文英  
王开富 王延海 王丽娜 卢文晖  
汤漳平 朱碧莲 刘石林 曲宗瑜  
陈书良 何明新 吴红 陆永品  
张国光 郑文 周建忠 杨柄校  
李大明 林维纯 赵逵夫 姚益心  
郝志达 姜昆武 徐耀明 徐志啸  
唐洪禧 郭维森 殷光熹 黄中模  
龚维英 常振国 韩基国 傅正兴  
颜新宇 戴志钧 萧兵

编辑部主任：鲜于煌  
编辑：易小松 熊建国

# 楚辞研究与争鸣

[楚辞学集刊第一辑]

## 目 录

序.....汤炳正( 1 )

卷头语.....编 者( 3 )

评《楚辞》为“巫祝者的文学”论

——日本白川静教授的“屈原否定论”的实

质.....黄中模( 6 )

评《楚辞》研究中的“巫化”倾向.....汤漳平( 34 )

是“巫歌”，还是屈原之歌.....曲宗瑜( 45 )

“屈原不是《楚辞》作家”论质疑

——评冈村 繁《楚辞与屈原》.....何明新( 54 )

《离骚》是屈原死后“记忆犹新”的人所作吗？

——与日本冈村 繁先生商榷.....鲜于煌( 74 )

屈原不是《楚辞》的伟大作家吗？.....郑 文( 87 )

屈原是不是诗人吗？——同冈村 繁教授商榷.....王开富( 99 )

尧舜“不慈”思想活跃时代之考辨

——与冈村 繁教授讨论《哀郢》的著作权.....熊建国( 114 )

论《离骚》、《哀郢》表现手法的一致性

——就两者“虚构”与“非虚构”问题与 冈村 繁先生商榷·····	易小松(125)
屈原的出现是一种“聚合效应” ——兼论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萧 兵(135)
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征 ——兼评屈原否定论·····	陈守元(153)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陆永品(170)
台湾《楚辞》研究近况综述·····	王丽娜(184)
屈原放逐时地考·····	台湾 胡子明(191)
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兼评张国光先生对《屈原列传》的十点质疑·····	翟鹏举(199)
屈原的想象·····	美国旧金山 徐超庸(212)
《楚辞》对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 ·····	日本 藤野岩友著 韩基国译(223)
《楚辞》生成过程展望 ——答陈守元、郭维森、黄中模、李世刚、卢文晖、吕培成、 曲宗瑜、张国光诸位先生 ·····	日本 三泽玲尔著 韩基国 译(245)
后 记·····	(262)

## 《楚辞研究与争鸣》序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汤炳正

绵亘两千多年的中国“楚辞学”，二十世纪十年代以来，确实出现了一派可喜的景象。不仅老一代的学者，出其长年的积累，钻研琢磨，不断前进。而最令人兴奋的是后起的一代新秀，他们一面善于继承前人的学术遗产，一面更以其旺盛的创造力和特有的敏锐感，勇于开拓新领域，大胆试用新方法，学术成就，尤为斐然可观。“楚辞学”的发展形势，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开国以来，中国的台湾地区，由于种种特殊原因，造成了学术交流的隔阂，但也正由于同一原因，故土情深的台湾学术界，倾心于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或阐骚经之《新诂》（苏雪林有《楚辞新诂》），或展《九歌》（钱穆有《九歌当为屈原作品》）而辨诬，至于胡子明的《楚辞研究》、吕正惠的《泽畔的悲歌：楚辞》却能从不同角度呈现新义，可见台湾的屈学研究，亦大有风起云涌之势。据我们从不同的渠道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看，其中不少论著，从评析到考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这无疑应当引以为我国学术界的骄傲。

但是，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曾对我说：“象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事实确是如此。远且不说，就以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而进行纪念之后，各国学术界对屈原的研究，一时蔚然成风。苏联、匈牙利、美国、英国的汉学家研究《楚辞》，时有新作。尤其是日本学者，以其与中国文化有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以及屈原作品对日本文学的滋润沾溉，深入人心，因而日本的《楚辞》研究，名家辈出，胜义如云。虽观点互有异同，而都以相当的深度与广度，著称于学术之林。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学者讨论屈原问

题，促进了两国学者间的文化交流。当然，中日的文化交流，还处于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我们所了解的，只不过是鼎尝一脔，难得其全。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作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来讲，学术界的交流与争鸣，确实极为重要。但从上述事实看，无论国内或国际，“楚辞学”的兴旺发达与相互的切磋琢磨，其间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不可讳言，这对屈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其成为名实相副的世界“显学”，是很不利的。

正由于上述原因，在重庆师范学院《楚辞》研究室的主持下，创办了《楚辞研究与争鸣》，目的是借此交流国内外屈学成果，使所见略同者，相得益彰；结论歧异者，相互砥砺，从而促进“《楚辞》学”的健康发展。对此项开拓性的盛举，某虽不敏，颇愿为之鸣锣开道，以观其成。故特级数言如上，以表微忱！

1988年5月29日



## 让民族文化瑰宝永放光芒——卷头语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一座耸立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文学史上的艺术高峰。它的艺术光芒照亮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它的养料哺育了整个古代文学的成长，并且还继续滋润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楚辞》的价值是永存的。

屈原是《楚辞》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革新政治、振兴楚民族、统一全中国的进步理想，抒发了同情百姓、热爱乡土、眷念楚国的爱国感情，反映出他同腐朽社会势力进行坚决斗争、九死不悔的坚强意志和以身殉国的崇高品质。追求光明，揭露黑暗，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敌侵略，关心民生疾苦，歌颂自我牺牲精神，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进步文学的一个基本潮流，这是与屈原的伟大诗篇分不开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热爱人民，痛恨一切祸国殃民之徒，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一切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重要思想品格，这是同屈原的伟大思想和人格的感召息息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及其作品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和精神面貌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由集体歌唱转到个人创作时代的开始，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屈原的诗篇开创了我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流派，李白、李贺、苏轼、汤显祖、蒲松龄等浪漫主义大家，没有一个不是在楚辞光辉的照耀下登上艺术高峰的。由他们的创作构成的古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和由《诗经》开创的，以杜甫、白居易、陆游、关汉卿、吴敬梓、曹雪芹等人的创作构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犹如我国大地上的黄河、长江是维持中华民族永不衰老的生命的

大动脉一样，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两股汹涌奔腾的巨大洪流，形成了古代文学发展的主旋律，确定了古代文学的进步倾向和面貌。所以自古以来常常诗骚并称。

《楚辞》的出现开始了古典诗歌发展的新阶段。它打破了《诗经》四言句的定式和重章迭句的篇章格局，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章法灵活多变的新体裁，是诗歌形体的一次解放。它对于我国各式各样的旧体诗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对赋体文学的形成，更是有直接的影响。

总之，《楚辞》这朵文苑奇葩，它丰富的进步思想一直鼓舞着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去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前仆后继地进行英勇的斗争；它高度的艺术成就始终是后代文学学习的楷模。真可谓衣被百代，沾溉千古，照耀万世。

《楚辞》不仅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珍品。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它的伟大代表屈原，早在1953年就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纪念。苏联著名学者费特林曾说：“屈原是不可比拟的杰出的古典诗的创始者。”“是世界文学之前列中最杰出的不朽诗人和作家之一。”“屈原的作品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同时也是全体进步人类”的财富。（《伟大的中国爱国诗人——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年》，载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当前在日本、美国、苏联，以及别的一些国家，都有许多学者在从事楚辞研究，楚辞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近几年，台湾、香港、大陆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中外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这对《楚辞》学的开拓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更好地继承全人类的这份宝贵遗产，使之更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和发展，更好地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繁荣，需要中（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外《楚辞》学者，加强联系，交流心得，相互切磋，开展争鸣，把《楚辞》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大加拓展。为此

目的，我们在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下，编辑了这本《楚辞研究与争鸣》——楚辞学集刊第一辑，以交流中外楚辞研究成果，活跃研究气氛。我们的原则是：发扬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争取继续编辑楚辞学集刊，欢迎观点鲜明，见解新颖，说理透辟，言之有物，语言精炼的文章，恳切希望研究《楚辞》的老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同我们加强联系，随时赐教。

编者

# 评《楚辞》为“巫祝者的文学”论 ——日本白川静教授的“屈原 否定论”的实质

黄中模

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楚辞文学”。此书有许多新见解，颇费功夫，能启迪人意。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此书对《楚辞》性质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楚辞》是“楚巫集团”所作的“巫祝者的文学”论<sup>①</sup>，（以下凡引白川静先生的文章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乃是值得商榷的论点。

说《楚辞》是“巫歌”，在我国与日本的学术界中，也有此说<sup>②</sup>。但是白川静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楚辞》的作者为“楚巫集团”说，这就发展了过去的《楚辞》为“巫歌”的论点。白川静先生从各方面来论述了这个问题，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1）楚国有一个“楚巫集团”，而屈原就是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是“统领楚巫”而且“肩负楚巫命运的人”。

（2）《楚辞》的主要作品是楚巫者们的集体创作，而非“特定个人”的作品。

（3）《楚辞》文学的性质非进步的英雄性的作品，而是保守者“失败主义”的“悲歌”。

现就以上三方面的内容为主，分别进行论述，以就教于日本朋友，并以此作为交流研究与学习《楚辞》的心得。

## (一)

对于屈原，白川静先生认为他是“楚巫集团”的“领导者”的命题，包含着许多内容。

首先要说明的是：白川静先生与日本的一些“屈原否定论”的论点，有不同之处：他肯定了屈原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尽管他有怀疑并说：

关于屈原这一历史人物，虽然还存在着视之为疑问的见解，但《史记》中载有屈原的传记，姑且可以把他作为实际存在的人物看待。

他引用了《史记》所记载的屈原身世与从事的政治斗争事迹，特别是他根据贾谊的《吊屈原》文，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屈原“这个人的实在性便无可怀疑了”。这说明他是相信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和贾谊的《吊屈原文》的真实性的。这是白川静先生与日本一些持否定屈原的学者的不同之处。第二，他说：“屈原是从王族中推选出来掌管楚国祭祀仪式的圣职人物”。是“代表楚巫的人物”和“楚巫集团的领导者”。

这两个结论：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其论点和论据都不可靠。要辨明屈原是不是“楚巫集团的领导者”，还得对以下诸问题有一个鲜明态度和清楚的认识：

首先，要弄清楚国是不是有一个“楚巫集团”。白川静先生说：“在楚地自古以来就流行巫祝之风。”这是对的。楚国人信鬼神、好巫祀，历来人们都是承认的，从先秦古籍的记载看，楚国朝中也设有巫祝之官；但是从未见古籍载有在怀王时期，楚国朝廷上，存在着一个“楚巫集团”。所谓“集团”，意味着志同道合有密切来往的一伙人。据作者在文中说，《楚辞》中的《九章》“应当与《离骚》联系起来理解”，而“这八篇”，则是：述说楚巫集团在政治对抗中败北、被驱除出郢都、和在

无尽的漂泊中崩溃的过程。

既然这个集团能够称得上与对手进行“政治对抗”，那就不只是屈原一个人了。如果这个论题能够成立，作者就应当有真凭实据，在文献中举出几个人来，以他们的事迹来说明这群巫祝者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伙。然而遗憾得很，作者的文章举不出任何历史人物和事实来证明他的论点。如果硬要说有例证的话，当然也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找出个别人的名字。例如他说：

这个巫祝集团有一女巫领导人，名叫“女媭”，据说是屈原之姊，其墓在秭归县。

这是引自《离骚》中的“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置予”一段话。

作者把这段话解释为：

当今之世，一切非朋党之力是不能行动的，为何要选择孤立的道路呢？这就是女媭的主张。

这个例子有两个问题：第一，把女媭当作“女巫”，而且是“楚巫集团”中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对于女媭的解释，过去的注家如王逸解释为姊；郑康成注《周易》，解释为妹，汪瑗的《楚辞集解》释为“贱妾”。自明清以来，研究者虽多同意旧注视之为姊，但自张凤翼、张云璈等，引《汉书·高帝纪》称吕禄过其姑吕媭指出吕媭是樊哙的妻子，而谓媭“乃女巫之通称”<sup>①</sup>以来，同意的学者更加多了。所以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自注云：

女媭旧以为人名，或说为屈原姊，或说为屈原妹，均不准确。今姑译为“女伴”，疑为屈原之侍女。

这是比较通达的解释。过去的旧注，虽有人如清周拱辰的《离骚草木史》引《汉书·广陵王胥传》：“胥迎李巫女媭”为证，说“媭乃女巫之称”。但对这种说法，游国恩先生在《离骚纂义》中曾予以辨正云：

周拱辰、林昌彝因《汉书》有李巫女媭，遂以媭为女巫

之称，可谓牵强之极。盖巫者名嫫，名嫫者固不必皆为巫者也。吕后之妹亦名嫫，岂亦巫者乎？

这说明白川静先生沿袭我国旧注将女嫫释为女巫是不恰当的。因为：第一，女嫫在《离骚》中的活动，没有任何巫祝的行为与言论，要把她释为巫者纯属读者强加在她身上的，当然更不能说她参加了“楚巫集团”的活动了。第二，白川静先生错误地理解了女嫫的主张。通观女嫫之言，以鲧作戒，故清王萌在《楚辞评注》中说女嫫之言是：“其意恐其过异以罹祸耳，非欲其苟同以变节也。”故游国恩先生亦在《离骚纂义》中言：“王萌之说甚允。”这当然更谈不上女嫫主张“一切非朋党之力是不能行动的”。可见白川静先生此说是徒添枝节，大可不必。第三，女嫫是作家虚构的人物形象，并非实有，岂能以巫者视之？他的著作能举出是“楚巫集团”中的，仅此一人皆属于虚，所谓“集团”之论，岂非沙滩上之七宝楼台，毫无构筑的基础吗？

其次，要辨明屈原是不是巫祝者。从现有的历史记载的材料看，还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有过巫祝行为。

作为一个宗教职业的巫祝者，必定要从事巫祝活动。据《周礼·春官》的规定，男巫做的事很多如“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同。”当时各国的巫祝不能例外。故《荀子·王制篇》云：

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

楚国的巫祝除了要作这些事儿外，朝廷对其还有更严格的要求。

《国语·楚语下》云：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

之祝。

从文献记载的楚巫的活动来看，与上述规定的职责是一致的。如：

《左传》文公十年：“初，楚范巫裔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

《礼记正义》卷十：“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这证明楚巫所从事的是宗教迷信职业的活动。如果屈原是楚巫，他的职业必不能超出上述规定的范围。但任何历史与古籍的记载，未说屈原曾经干过这些事。在怀王信任他的时候，他没有去为怀王祈祷“千秋万岁”；在怀王去世之后，他并未去行吊丧的礼节，作“巫先拂柩”之类的事。白川静先生一再提及“巫风”之说。按墨子的解释：“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sup>④</sup>在历史典籍中，也未记载屈原曾与群巫一起，在宫庭中为怀王跳舞。相反《史记·屈原列传》却记载他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因而“王甚任之”。这是内政外交方面的国家大事，与巫者之祈祥占卜，祭祀祷告，祝寿活人有何相干？《屈原列传》是白川静先生肯定了，它是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历史见证。这雄辩地说明屈原不是巫祝者。

再者，要识别屈原是不是一个“掌群巫之政令”的巫卜之首，即是否为“楚巫集团的领导者”。

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管理群巫之官为“司巫”，官阶不高，仅为“中士”。他“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负责占卜的，设有卜师、大卜及占卜等官职，各负其责。楚国设有“太卜”，见《卜居》称：“见太卜郑詹尹。”由此类推，似也设有“司巫”或“巫尹”之类的官来“掌群巫之政令”。另外从《史记·封禅书》记载刘邦



统一天下之后，曾设置祝官、女巫的情况看，也可证楚有专门的巫祝之官。太史公云：“（高祖）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其中设立了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等巫官。裴駮《集解》引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刘邦是楚人，他设下的巫官，可能保留了楚国的一些遗俗。这说明巫祝之官的职责，一定要与掌管神位、祠庙之属有密切关系，否则，不得称巫也，何况为“巫祝之首”乎？

白川静先生不考察上述巫祝之官的特点，便以屈原曾作“三闾大夫”之职，为巫之首。他说：

屈原是从王族中推选出来掌管楚国祭祀仪式的圣职人物。《史记》说屈原任三闾大夫，三闾为司王族屈、景、昭三家之职。屈原大概是掌管官庭祭祀信式，统领楚巫的人物。

并由此推论屈原是“楚巫集团的领导者”，是“统领楚巫的人物”。这种论断有何依据？白川静先生没有举出任何文献来证明他的这个断语，只是用“大概”一词进行猜测。这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对于“三闾”之职，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说得明白：

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

所谓“掌王族三姓”，即统管王族之意。“屈原序其谱属”以下，是统管的内容。绝不是像白川静先生说的，只是“掌管官庭祭祀信式，统领楚巫”。如果说，三闾之职要管公族，充其量其中的“巫首”归他管理而已，并不能说他就是群巫的头子。此外，他还要“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参与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活动，